

李大钊诗中的图强求变

□ 张 朋

李大钊，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者，不仅撰写了大量关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性研究性文章，还写了许多生动活泼的杂文、散文、随感等，更留下了多首感怀时事、隽永深厚的诗歌，意境雄浑，耐人寻味。这些诗写于1908年李大钊求学天津法政政专门学校至1919年五四运动风起云涌之时，反映了国家的沧桑沉沦，记录了他的行迹感怀。这些诗中，写了新文化运动以前的是旧体诗，有五言、七言，有律诗、绝句，显示了李大钊古文功底的深厚；写于新文化运动以后的多是新诗，白话有韵、形式自由，是李大钊对新文化创造的率先垂范。不论形式上的新与旧，李大钊的诗在主题上始终贯穿着深沉的家国情怀，表达了他匡时救国的雄伟精神。

家国十年多隐恨

1907年，18岁的李大钊从河北永平府中学堂考入天津法政政专门学校学习政治经济。时值晚清末年，国家残破、民生疾苦，李大钊目睹当局的腐败无能，将拯救国家奉为义不容辞的责任。他把自己的住所取名为“筑声剑影楼”。“筑声”出于春秋时代荆轲、高渐离刺秦王的典故，李大钊以此表达他鄙鄙当局、崇尚狭义、以身报国的强烈愿望。入学后第二年，李大钊写下《登楼杂感》二首，这可能是我们所能见到的李大钊最早的诗篇。其二首：“感慨韶华似水流，湖山对我不胜愁。惊闻北塞驰胡马，空著南冠泣楚囚。海天寥落闲云去，泪洒西风独倚楼。”北塞驰胡马，意指帝国主义对我国的入侵；南冠泣楚囚，指被压迫民众为家国危亡而哭泣。李大钊用这样的诗句表达对国家灾难的悲愤、有志未伸的遗憾。

1911年，李大钊好友蒋卫平因反抗帝国主义入侵，在黑龙江边被杀害，李大钊写下悼亡诗《哭蒋卫平》二首，其中写道：“国殇满地都堪哭，泪眼乾坤涕未收。半世英灵沉漠北，经年骸骨冷辽头。”他是在哀伤蒋卫平的牺牲，更怀有对国家落后任人欺凌的深深义愤：国殇满地，正是当国者之责；英灵沉漠北，就因主政者无能。李大钊继而写道：“千载胥灵应有恨，不教胡马渡江来。”假使伍子胥地下有知，看到后世子孙任人宰割也应是恨不争气、怒从中来吧。

1913年，李大钊凭吊圆明园故址，满目疮痍令他感慨万千，写下“圆明两度昆明劫，鹤化千年未忍归”“残碑没尽官人老，空向蒿莱拔劫灰”等沉郁悲怆的诗句。从圆明园来到颐和园，看到往日统治者压榨人民建造的园林，李大钊写下《咏玉泉》一首，“殿阁嵯峨接帝京，阿房当日苦经营。只今犹听官墙水，耗尽民膏是此声！”这些慷慨悲凉的诗句，无不展现了李大钊忧国忧民与图强求变的沉思与呐喊。

相期吾少年，匡时宜努力

1913年，李大钊在友人资助下赴日本求学，次年考入早稻田大学学习政治。这期间，他同几位中国留学生组织了经济学会，读了很多书，更多接触了社会主义思潮，开始研究关于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他的爱国思想也进一步发展，发起组织了神州学会，秘密进行反对袁世凯的活动。这一时期，李大钊的诗不再仅仅是忧愤时弊、揭露腐败，而是抒发再造神州、创建理想之中华的壮志，蕴含了激越浩荡的英雄气概。

1915年底，袁世凯称帝，蔡得在云南组织义军进行讨伐。李大钊在日本积极支持云南义军，为其筹措军饷。1916年1月，为了联系国内的反袁事务，李大钊从日本回国短暂小住，在归国途中，他写下一首《太平洋舟中咏感》的五言赋体长诗。诗的前半部分是对袁世凯“一夫终穷鬼”的声讨和对“义声起云南，鼓鼙动河北”的欢欣，诗的后半部分则用比兴手法抒发胸臆，表达他要扭转乾坤的豪迈志向：“鹏鸟将图南，扶摇始张翼；一翔直冲天，彼何畏荆棘。相期吾少年，匡时宜努力。男儿尚雄飞，机失不可得。”时不我待、男儿雄飞的铿锵诗句，将李大钊匡时救国的信念抒发得饱满而又明朗。

1916年春，李大钊在江户送友人归国，临别之际，李大钊与其“相约再造神州”，并怀着战斗风雨、跋涉泥泞的心情赋绝句一首，“壮别天涯未许愁，尽将离恨付东流。何当痛饮黄龙府，高筑神州风雨楼。”将离别的愁绪化为前进的豪情，与腐朽势力斗争到底，直到创建出理想之中华，这就是李大钊的期许与志向。不久，李大钊再次送别友人，他以诗相赠：“逢君已恨晚，此别又如何？大陆龙蛇起，江南风雨多。斯民正憔悴，吾辈尚蹉跎。故国一回首，谁堪返太和！”就在此诗写后不久，李大钊未等卒業，于1916年5月左右离日回国，投入到改造中华的磅礴奋斗中。

因为你拥护真理，所以真理拥护你

李大钊回国后，新文化运动蓬勃而起，他参加了这一运动，并成为其中的旗帜性人物。新文化运动如同风雷一般响彻中国大地，李大钊欢欣鼓舞，他的诗也体现出从未有过的清新与欢愉。

1919年夏天，李大钊登临河北昌黎五峰山，写下了三首白话文新诗《山中即景》。第一首：“是自然的美，是美的自然；绝无人迹处，空山响流泉。”这是对山河无恙、静谧安好的欣慰吗？第二首：“云在青山外，人在白云内；云飞人自还，尚有青山在。”这是对风云变幻依然自由独立的赞美吗？第三首：“一年一度果树红，一年一度果花落；借问今朝摘果人，忆否春雨梨花白。”这是为岁月轮转、生命新生抒怀吗？三首白话诗即景写情，语言平实自然，却透露出无限的生机与希望。这正是李大钊对未来信心满怀的真实写照。

新文化运动期间，十月革命爆发，李大钊兴奋地写道：“人道的警钟响了！自由的曙光现了！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他以无限热情迎接了人类新纪元的曙光，成为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驱。

1919年，李大钊发表《欢迎陈独秀出狱》一诗，诗中写道：“你今出狱了，我们很欢喜！他们的强权和威力，终究战不胜真理。什么监狱什么死，都不能屈服了你；因为你拥护真理，所以真理拥护你”，坚定表达了对马克思主义真理的矢志信念。诗中还写道：“你今出狱了，我们很欢喜！别别才有几十日，这里有了许多更易……我们现在有了很多的化身，同时奋起：好像花草的种子，被风吹散在遍地”，热烈描绘了五四运动以后全国革命形势的迅速发展。在此之后，李大钊以全部身心投入革命活动中，直至壮烈牺牲。

李大钊是革命家，也是思想家，是战士，也是诗人，他用一生谱就了一首最为壮丽灿烂的光辉诗篇。正如鲁迅先生赞颂的，“他的遗文却将永住，因为这是先驱者的遗产，革命史上的丰碑”。

老一辈革命家诗词赏析



大鸾腾飞的地方

——走进淮安周恩来故居

□ 陈 苗

镇淮楼畔浮云白，骑马巷前夕阳斜。淮安的骑马巷7号是周恩来总理的故居。不同于武大珞珈山的周恩来故居和绍兴的祖宅，位于淮安骑马巷的故居是周恩来的出生地和童年居所。走进故居大门，首先看到的是“六个杰出楷模”红色匾额，这是2018年，习近平总书记纪念周恩来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用“六个杰出楷模”，高度概括了周恩来的高尚品德、崇高精神以及伟大风范。

故居由东西相连的两个宅院组成，每个宅院都是曲折的三进院，整体为青砖、灰瓦、木结构的平房，是典型的明清时期苏北民居。1898年3月5日，周恩来便诞生在故居东宅院，生逢晚清乱世，局势动荡，望子成龙的周家人取其乳名“大鸾”。周家以神鸟典故取名，寓意天下太平。周恩来在淮安的12年生涯，除在外祖父家和嗣母陈氏娘家生活的那段时间，其余岁月居住在此，这12年的童年生活对他以后的革命生涯都具有重要的影响。

对于故居，周恩来曾“约法三章”：不要让人去参观；不准动员住在里面的居民搬家；房子坏了不准维修。直到周恩来逝世两年后（1978年）开始按原样筹建修复，1979年3月5日，故居正式对外开放，故居匾额为邓小平题写。

故居东宅院现为原状陈列，是对周恩来童年生活场景的原状再现。展示了其生父母、嗣父母、乳母的房间，汲水的水井、百年榆树……一屋一景、一草一木见证了他人生的第一串足迹，印着着人生的第一段身影。在这里，生母王氏、嗣母陈氏、乳母蒋江氏三位妈妈给了他做人、做事及

思想、文化最初的启蒙，这三位母亲将周氏家训中“诚”“忍”“俭”三种品德融进周恩来的人格之中。生母王氏以诚待人、热心助人，教会了周恩来“诚”；嗣母陈氏才学出众、低调隐忍，让周恩来知道“忍”；乳母蒋江氏带着周恩来自己种菜、俭以持家，使周恩来提前认识了“俭”。她们以宽严相济的家风家教引导着周恩来在以后生涯中修身、齐家、治国。

跨入东宅院便可见周恩来读书屋，也就是周家塾馆，馆内陈列着周恩来童年读书时使用过的书桌。按周家祖训，男童到5岁便要入家塾馆读书、习颜体。1903年，刚刚5岁的周恩来便开始在这几间书房读书，主要学习了《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等启蒙书籍。周家塾馆治学有方，读书房墙上悬挂着北宋哲学家周敦颐的《爱莲说》是塾馆家童的必学内容，“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的名句早已在童年大鸾心中扎根。周恩来说过，“一个人幼年所受的影响，往往在他的思想上、生活作风上长期存在”。

书房向西通过一道腰门，便依次可见周恩来诞生地、嗣母住房。在母亲的坚持下，童年周恩来虽然饱受艰苦，但是从未放弃读书。除了周家塾馆，他先后在清河十里长街以北的万家塾馆、龚家塾馆等五个地方读书。童年的读书经历和亲历封建社会的积贫积弱，使少年周恩来爆发出“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洪音。

待渡亭上登舟北，从此大鸾振翅飞。1910年，随着周恩来的生母、嗣母的相继离世，周恩来离家去东北求学。周恩来后来同美国记者李勃曼的谈话中说道：“十二岁的那年，我离



家去东北，这是我生活和思想转变的关键”。

西宅院现以“家”为核心，围绕家世、家风、家乡主线，推出了“大鸾腾飞的地方——周恩来家世家风图片展”“桑梓情深——周恩来与家乡图片展”等展厅。

在家世家风展厅，存放“爹爹遗像”的皮夹体现出总理至情至性的动人情怀；注重家庭，伉俪情深，他和邓颖超银婚纪念照下方的“八互”原则为后辈树立婚姻典范；以身作则，严于律己，墙上的“十条家规”让后人受益终生。他不仅为亲属定下十条家规，还经常组织家庭会议，强调过亲属关，亲属不谋私利、不搞特殊。

西厢房展厅的一个个周恩来家风小故事无一不展现了周恩来严于律己、清正廉洁的高尚品德。1971年，周恩来动员参军的侄儿周秉和回陕北插队当农民，教育他带头坚持扎根农村；1968年，为支援少数民族地区建设，周恩来鼓励侄女周秉建到内蒙古草原插队劳动；1961年，为保证农村劳动力，当年征兵的重点是城市，周

恩来动员准备报考大学的侄儿周秉钧参军；1952年，周恩来侄女周秉德根据国家需要，主动报名去北京师范大学读书，当一名普通教师……周秉德曾经接受专访回忆有关总理的家风故事时表示：家人就是普通百姓。

出西厢房进入故居后院，一棵雪松，一丛翠竹，一株腊梅，顿感绿意青葱。“生于斯，长于斯，渐习为淮人；耳所闻，目所见，亦无非淮事。”多年革命生涯，周恩来毫无保留地把全部精力奉献给了党和人民，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虽从未再回家乡，但是儿时的家庭、家教一直影响着周恩来总理的一生。



“耕读园”随想

□ 李 安

老家的侄子年前给我打电话，他把老家约一两亩大小的院子重新翻修了一下，并在一栋二层旧楼房的边上，加盖了有十余间徽派风格的瓦房，围起来像个四合院，倒也有些气象。侄子希望我题写宅名，我琢磨了一会，对侄子说：你爷爷教了一辈子书，你大伯、大姑父也都是老师，我也是读书人，家里算得上书香门第，“耕读传家久，诗书继世长”，院子名字就叫“耕读园”吧！

“耕读园”取“耕读传家”“半耕半读”“晴耕雨读”之意，一方面是希望高中毕业就去当兵、后来复员回乡的侄子平时多看些书，另一方面又何尝不是对自己退休生活的期许呢！这种期许里夹杂有对乡土故园的怀念，对年迈母亲的牵挂，还有一些希望为桑梓做些公益的执念。

（一）

我想起了苏东坡，那个在我的文化人格和精神世界烙下深深印记的人。

1079年，苏轼因乌台诗案被贬谪到黄州（湖北黄冈）。苏轼在朋友马梦得的帮助下，获得了一块有水源的荒地，缺衣少粮的苏轼一家人在这块荒坡上盖起了房子，“去年东坡拾瓦砾，自种黄桑三百尺，今年刈草盖雪堂，日炙风吹面如墨”；种上了粮食，“种稻清明前，乐事我能数”。

苏轼自号东坡居士，于耕读之余，创作了如《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浣溪沙·细雨斜风作晓

寒》《念奴娇·赤壁怀古》《前赤壁赋》《后赤壁赋》等光耀千古的作品。黄州的耕读生活治愈了苏东坡疲惫的身心，在与田园相处、与天地对话的过程中，苏东坡获得了充沛的能量，这是一场永不止息的生命修行，即使后来在流放儋州，“空庖煮寒菜，破灶烧湿苇”更为艰难的岁月里，苏东坡依然能够做到“何妨吟啸且徐行”。

梁漱溟先生曾说：在中国，耕与读之两事，士与农之两种人，其间气脉浑然相通而不隔。与苏东坡可堪一比的是陶渊明，因“不为五斗米折腰”，陶渊明过了20多年的耕读生活，“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既耕亦已种，时还读我书”。同样，在耕读生活之余，他写下了《归去来兮辞》等不朽诗词歌赋。但我以为，如果说，陶渊明的田园生活成就了他的超然人格，苏东坡则在躬耕陇亩的贬谪生活中获得了无与伦比的能量，这种能量让他有一颗坚强而悲悯的心，足以面对风刀霜剑，足以穿越人世间的一切苦难，独步天下。追论诗词高下，从立身处世上来说，苏东坡在“耕读”生活中成就了最好的自己，一个千百年来为中国人所喜爱、积极乐观、深情智慧才子。

（二）

历史发展到今天，我们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从物质层面来看，农村、农业的发展进步成就瞩目。远的不说，就在我家

老宅不到3公里的地方建有一座高铁站，从皖西南老家到合肥、武汉、上海等城市都在一两个小时以内就可以抵达，即使从北京出发，六七个小时也是可以到家的。互联网、移动互联网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交通、通信如此便捷，这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

但是另一方面，老龄化、空心化还在乡村不同程度存在着，乡村教育、乡土文化、族群认知、乡村治理等都需要重视。国家在乡村振兴层面已有了顶层设计，地方政府也不断出台措施推动基层实践，乡贤文化、生态文化、宗祠文化建设已有成效，特色产业、民宿经济、乡村旅游亮点不少。如何点亮乡村，复原乡村？我一直在思考，乡村文化建设是不是可以“耕读文化”复兴为抓手呢？

在中国传统语境中，“耕”与“读”不仅是生业技能，更是一种价值观念、美学理想。即使到了今天，耕读传家作为农耕中国的文化逻辑，仍然以文化人格的方式自觉体现于日常思维、风俗习惯和生产实践中。虽然从技术层面上来说，传统的耕读已成为某种意义上的文化“遗产”，但是在家风、乡风、民风的建设上，在其能指与所指上，耕读文化已然包括了乡村振兴的其他内容，耕读文化熔铸了田园文化、生态文化、乡贤文化、书院文化、宗族文化的种种元素和因子。

（三）

人类学家将人类文化的传承分

为前喻文化、并喻文化和后喻文化。所谓前喻文化，指的是农业文明时代，祖辈经验向后代传承；并喻文化是指工业文明时代，知识和经验同代传播；后喻文化指的是在信息时代尤其是智能时代，文化的传承方向发生了逆转，年轻人掌握的新知识反向传递给信息接受落后的前辈。所以“耕读园”的设想应该着眼于建立新的耕读文化体系，以契合时代精神的价值观念、科学技术、产业模式、审美内涵以赓续乡土文脉，兴办乡村教育，敦人伦，厚风俗。

“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我的老家宿松处于大别山南麓，长江下游北岸，是典型的“鸡鸣三省”之地，西边与湖北黄梅接壤，南部和江西湖口、彭泽隔江相望。最为难得的是，县域内有黄湖、泊湖、大官湖和龙感湖四大湖泊，我出生的村庄即在龙感湖湖滨。龙感湖为“不越雷池一步”的古雷水的一部分。我从18岁负笈远游外出求学，故乡渐成遥远的风景，夕照下的香樟树，百里藕田万亩荷花，风吹稻花香两岸，鸡鸣犬吠炊烟袅袅，故乡的风物在离开后的30多年成了我生命中最为亲切柔软的存在。我想，老家“耕读园”或许可以成为我返乡之后为家乡学子、邻家儿郎传道授业、介绍外部世界的一个“私塾”？进一步又想，可否再邀约一批在外学有所成、业有专攻的乡友定期不定期回乡，为乡村振兴、产业振兴、生态文明建设一起出谋划策，添砖加瓦？

随想至此，天宽地阔，我心光明。